

骆宾王任职临海丞探秘

◎文化史谭 □郑瑛中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咏鹅》诗，竟是唐人骆宾王7岁时所作，不称为“天才”，还真想象不出更贴近的词语了。在清波荡漾、风景绮丽的临海东湖公园里，今人建有一座古朴典雅的“骆宾王祠”，它与同城北固山麓的唐代古祠——郑广文纪念馆(又名郑广文祠)，再现了唐代“初唐四杰”骆宾王与享誉“诗书画三绝”的广文祠博士郑虔当年在台州这方热土留下的不朽足迹，两祠共同构成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海一幅悠远的唐风画卷。

遗憾的是，新旧《唐书》中骆宾王虽有本传，但对他任临海县丞一事却语焉不详，仅一笔带过；如《旧唐书》记曰：“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贼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骆宾王“弃官而去”，是在任临海丞前抑或任后？颇让人费解。

到了民国，何奏簧先生等编纂的《临海县志稿》对此事亦不了了之，没有为骆宾王记事。在《临海县志稿》卷四十二《记遇》中，仅引邑人、清康熙进士洪若皋主编《康熙临海县志》中的《骆丞未到台州》一文：“武后光宅元年(684)……与李(徐)敬业、唐之奇、杜求仁等俱坐事……骆宾王贬临海丞，是年秋，俱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遂谋匡复。”看来，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认定骆宾王“贬谪”与“谋反”同在光宅元年，并非《旧唐书》说的“怏怏失志，弃官而去”，对其任临海丞持否定态度。人们不禁要问：既有“骆临海”之名，为何没有“临海丞”之实？于此，笔者想试探一二。

骆宾王字观光，概取《易·观·六四经》“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语，婺州义乌人(今金华义乌)。天资聪颖，七岁即能赋诗，人称“神童”。成年后，尤妙五言诗，作《帝京篇》，时为绝唱，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四杰”或“四才子”。

骆宾王学富五车，惜一生仕途坎坷。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对策入选，授奉礼郎。初为道府掾属、武功县主簿；间有淹留、闲居，落魄无行；曾从军出塞，奉使巴蜀地区，后调长安主簿，时已年逾半百。武则天即位后，于调露元年(679)仕至侍御史(从六品下)。永隆元年(680)秋因多次上疏，讽谏言事，被人诬告，言其在长安主簿时坐赃受赂，从侍御史上任问罪入狱达一年之久。永隆二年(681)夏乃贬任临海丞。途经家乡婺州义乌看望亲人时已“白头”，期间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与亲情书》诸诗。文明元年(684)参与徐敬业讨伐武氏，失败逃亡，客死他乡。

从永隆二年(681)夏至文明元年(684)，骆宾王到临海任职是有足够时间的，作为邑人和进士，洪若皋怎能说“骆丞未到台州”？

唐人郝云卿在所编《骆宾王文集·序》道，“文明中，徐敬业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为府属。”“文明”，为睿宗李旦年号，即公元684年夏秋间，是年皇位更替，一年中竟有三个年号：先为中宗李显，年号“嗣圣”；继为睿宗，改年号“文明”；终为武则天，又改年号“光宅”。中宗第二次复皇位时，鉴于骆宾王忠于李唐宗室，于神龙间(705～707)诏令郝云卿搜访骆宾王诗文集，此时离骆宾王坐事仅20年左右，乃当代人记当代事，应可信。文明与光宅是同一年，离永隆二年(681)夏骆宾王贬临海已越三年，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却把“贬谪”与“谋反”混为同一年，有误。

骆宾王在临海并无《旧唐书》说的“怏怏失志，弃官而去”之意。《骆宾王文集》卷五录有《久客临海有怀》诗，就题意言，宜居临海为时非短，且未涉及弃官事。其诗云：“天涯非日观，地极望星楼。练光摇乱马，剑气上连牛。草湿姑苏夕，叶下洞庭秋。欲知凄断意，江上涉安流。”

同集卷八《与程将军书》亦流露出他在任上曾帮助过程将军。这封书信是写给中宗嗣圣元年(684)任右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的，其书末云：“所恨禁门清切，造别无缘，官守牵缠，程其有限。某尚期辞满，俯泛孤舟，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心事，劳生无罄刻之欢。”据此，则宾王是年“官守牵缠”，与上诗“天涯”“地配”等词，均表示其在临海任上，欲期待“辞满”(任期满)之后，再泛孤舟。证明其时尚尚无弃官之举。后因中宗忽被武后所黜，想宾王顿感失望，欲伸张正义又或害怕株连，遂投敬业起事，史载“弃官”之说，掩盖了宾王此举与皇室矛盾之事。

故讨伐武则天的檄文称《讨武曌檄》，文词犀利，抑扬顿挫，痛快淋漓地直斥武周罪行。唐代学者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形象地记道：则天皇帝看到《讨武曌檄》中“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时，仅微微一笑；当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不禁暗自佩服宾王文才之盛，生气地说：“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把则天此话记作：“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此说后世一直盛传，《新唐书》《资治通鉴》《唐语林》等典籍均有类似记载。



骆宾王塑像

扬州兵败，宾王何往？当时就有“伏诛”“逃亡”“投水”三说。逃亡之说流传最广，徐敬业是起事的首领，兵败途中，被下属叛将王那相所杀，徐姓眷属逃窜几尽，从此改姓李氏。《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均言宾王与徐敬业、徐敬猷同“伏诛”。《新唐书》则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但民间有多说，比较合于实情的应是徐敬业后裔的李氏家乘所载：明朝时，李氏裔孙李于涛有《和骆宾王遗墓诗》四首，被收于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其诗引是这么记载的：“(涛)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起事扬州，讨武氏，不克，一时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尚庵公(按：敬业子)讳炯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古代扬州)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今江苏南通)，尚庵公具衣冠以敛……表其墓曰：‘唐文人骆某之墓。’载之家乘最详。”朱国禎《涌幢小品》亦记有明正德九年，(南通)海门发现骆宾王古冢之事。据此，宾王兵败逃亡，客死南通，或亦有据。

骆宾王传世文集，史载唐人郝云卿所辑凡十卷。今传世《骆宾王文集》为宋蜀本重雕，仅有文三十八篇、诗百二十五首、赋颂三篇，合计一百六十六篇，已非郝云卿所辑之全豹。注本则以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最通行。

蔡元培回应洋人无理要求

□唐宝民

在诸多亲历者的记忆中，蔡元培先生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待人彬彬有礼，而且特别好说话。但蔡元培并不是一个好好先生，身为北大校长的他原则性极强。

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前，北大开校务会议的时候，主要使用英语。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要求开校务会议一律用中文。这个决定引起了洋教授们的反对，他们向蔡校长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校长反问道：“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中国话？”洋教授们被问得哑口无言。因为蔡元培的坚持，从此以后，北大再开校务会，就只讲中文不讲英语了。

吴景超的学者胸怀

□姚秦川

1947年10月，在北平燕京大学适楼礼堂，一场主题为“中国工业化前途”的专题讨论会正在进行。讨论会的主体内容是吴景超和费孝通两位社会学家之间的学术辩论。

当时，吴景超和费孝通都执教于清华大学。虽然费孝通比自己小9岁，但吴景超却非常赞赏对方的才华，他之前给费孝通出版的几本专著都写过深度书评，这在吴景超的书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他曾这样评价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像这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溢美之词跃然纸上。

不过，当吴景超看到费孝通随后出版的《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书时，就没有那么肯定了，在他看来：“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不值得被如此寄予厚望，中国未来的前途必将依赖机器工作和都市文明。”该书“虽然写得很美丽，但是不正确的”。

金岳霖谈小说和哲学

□王吴军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教授出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本来，金岳霖是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但是，他却非常喜欢读小说，从中国的小说到外国的普鲁斯特写的小说和著名的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他都看。

金岳霖最喜欢看的小说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和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写的《江湖奇侠传》这两部书。

1938年，沈从文请他去给西南联大的学生作一次小说和哲学的学术讲座。当时，沈从文给金

北大有两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经常逛八大胡同。蔡元培对此非常不满，当他们的聘约期满后，就决定不再续聘他们了。那两名英国教授请求蔡元培继续聘请他们，被蔡回绝了。两人不甘心，又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到蔡元培求情，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不肯再给那两个英国教授发聘书。朱尔典感觉很丢面子，十分愤怒，临走时扬言道：“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蔡元培没有被这位来头颇大的英国公使吓住，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英国教授仍不甘心，竟然将北大告上了法庭。虽然摊上了官司，可蔡元培依旧坚持原则，聘请王宠惠代表北大出庭应诉，最终北大赢了这场官司。蔡元培在这件事上的坚持，维护了北大的独立尊严。

对于吴景超这次给出的反驳观点，费孝通并没有因为吴景超之前对自己的“厚爱”而选择接受，他反而在不同场合阐述自己书中所列观点的正确，大有与对方抗争到底的意思。大家都觉得费孝通的做法有些过分，不过吴景超却大度地表示，学术上存在的争鸣也很正常。

由于一时争论不下，最终他们达成一致，举行一场专题讨论会，让同仁作出正确判断。那天，当吴、费两人演讲完毕后，在场的社会学同仁也纷纷提出意见，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应该把机器工作与手工业配合起来，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最终，两人都能接受大家给出的这个意见，他们也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意见不合而心生嫌隙。

多年后，在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讨论会上，费孝通感慨地表示：“吴先生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学者，他并没有因为我的‘不报恩’而故意疏远我，还是像从前一直帮助我，关心我，他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

那年，3名德清青年北上投奔解放军

◎史海钩沉 □慎志浩

1948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德清县新市镇蔡氏麻线桐油店。四位心情抑郁的青年正在聊天解闷，谈论在纷乱变局下的人生出路。

门外，淅沥的寒雨敲打着泛青的石板路。此时的新市古镇物价飞涨，生意难做。从徐州战场溃退下来的数百名国民党散兵游勇霸占着新市街面，骚扰店铺，白吃白拿，衅事生非，稍一不顺心就打架斗殴，甚至拔出枪来威胁镇民。

“走！新市肯定是待不下去了。”蔡氏麻线桐油店少东蔡仁元说。

“那么到哪里去呢？”在上海求学返乡的沈国豪问道。

是啊，到哪里去呢？

沈国豪生于1928年1月，此时已经21岁了。因在上海读书，工作了几年，见多识广，小伙伴们让他拿主意。

沈国豪说，比较简便的路是去安徽找国民党保安部队，他有同学在那里当军官。但是，徐蚌会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大败，再去找他们，肯定没有出路。还有一条路是过江去苏北，投奔解放军。

蔡仁元说，退下来的伤兵也在到处说，解放军打仗很厉害，几十万国民党兵都被吃掉了。

说到过江投奔解放军，褚凤章来劲了。他说：“我在上海纱厂工作时，有个同事叫程展中，和我很要好。他曾动员我去苏北解放区，是有前途的。纱厂倒闭后，他回到苏州的家里。”

沈国豪说：“你早怎么说没？”

褚凤章：“去苏北要过长江，正在打仗，风险很大，搞不好性命交关。所以我没敢说。”

沈国豪：“你马上跟程展中联系一下，看看苏北现在还要不要人？”

褚凤章：“好。”

沈国豪：“凤章先去探探消息，我们这边分头准备起来，如果可行，我们立刻动身。”

“好的，好的。”同伴们纷纷应允。

褚凤章准备动身去苏州找程展中。

沈国豪回家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其父虽然也犹豫，但认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走走，于是拿

出了一枚3钱的金戒指，还有几个银元，交给沈国豪。

几天后，褚凤章从苏州回来。他们继续在蔡氏麻线桐油店碰头。

褚凤章说：“苏北那边还要人的。而且程展中说我们如果去的活，他也跟我们一起去。”

于是，沈国豪、褚凤章、蔡仁元，还有一沈姓的新市青年马上拍板一起去苏北投奔解放军。

过了三天，到了他们约定的出发时间的前一晚，蔡仁元突然说：“店里脱不了人，去不了了。”大家顿觉诧异，都劝他一起去。

蔡仁元说：“你们先去吧，替我报个名。我先做你们在新市的联络员，你们有什么消息，由我来转告你们家里。”伙伴们见他决心已定，也就随他了。

第二天凌晨，新市南栅轮船码头。二沈一褚三位新市青年登上了苏杭班，也踏上了一个全新的前途。

“寒雨，很冷。”多年后，沈国豪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道。

当天晚上，他们仨在苏州码头上岸，与等候在那里的程展中会合。

程展中说，他有个表兄在苏北解放军部队。表兄告诉他，解放军在泰兴有接待站，我们可以先去那里报到。

他们四人乘坐火车赶到镇江，再坐长江渡轮，过江到扬州，再辗转坐车到达泰兴县。

沈国豪在回忆录中说，尽管当时兵荒马乱，但他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在泰兴县城，是解放军官兵忙忙碌碌的身影，还有地方热烈支前的氛围。这让来自江南小镇的青年人感到好奇、兴奋，原先抑郁紧张的心情渐渐散去。

他们到接待站报到，填表。

接待站的同志和他们分别谈话，问他们各自的经历、家庭情况，以及为什么非要冒着风险过江来参加解放军。他们一一作了回答。

经初审合格后，接待站的同志开出介绍信，介绍他们到泰州解放军某机关报到。经某机关再审查，他们被安排参加华中革命大学学习培训。

1949年4月18日，沈国豪被编入解放军江南



摇着船儿进城

绍兴古城都泗门是国内少有的旱门和水门合为一体的城门，这里是旧绍兴的重要商埠，内有许多港汊，船只停泊鳞次栉比，桅樯如林，一直延伸到长桥、保佑桥的大埠头。图为上世纪初城门内侧的景象，城楼两侧设有跑马道，有艖公正摇着船儿进入城内。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